革命文学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

□张 炯

今年是何其芳的百年诞辰，他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我常常想，如果何其芳还健在，会多好！缅怀他的生平和他为我国文学事业献身的榜样，我永远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他实在是去世得太早了，不然，他肯定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著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何其芳是筹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并为文学所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老所长。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和党委委员，为学部的建设做过许多工作。他从青年时代离开故乡到北京大学上学，后来到山东从事中学教学和文学创作，并以《画梦录》荣获《大公报》文学奖而知名于文坛。1938年他偕同沙汀,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他一改早期唯美的诗风，写出给少男少女们的《夜歌和白天的歌》，歌唱新的生活、新的情感，受到全国广大青年的欢迎。后来他又被派到重庆做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除了写诗，还撰写了许多文学评论，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解放战争中，他被派到前线，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新中国建立后，他从马列学院调任当时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所长郑振铎筹建文学所。郑振铎因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工作繁忙，所以文学所的工作实际多由何其芳主持。1956年文学所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1959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何其芳就接任所长，一直到1977年去世。他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这一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广泛罗聘人才，收购大量图书，健全科研组室，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创办后来名满全国、影响及于全世界的重要刊物《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真是殚精竭虑，献出了他后半生的大量心血。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可谓名家荟萃，群贤毕集。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王伯祥、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吴世昌、陈翔鹤、张白山、吴晓铃、蒋和森、邓绍基、刘世德、王水照等,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戈宝权、季羡林、卞之琳、罗念生、潘家洵、杨绛、朱虹、董衡巽、吴元迈等,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唐弢、毛星、朱寨、樊骏、林非、吴子敏、蔡葵、何西来、蒋守谦,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蔡仪、王辽荧、王淑明、曹葆华、缪朗山、柳鸣九、钱中文、王春元、涂途、王善忠、李传龙、张国民等,民间民族文学研究方面有贾芝、卓如、祁连休、马昌仪、吕薇芬、仁钦道尔吉等。为了罗聘许多著名学者来所工作，何其芳不但登门礼聘，还亲自为之跑待遇、找房子。为了罗致合格的青年研究人才，他专门派人到高校择优录取，还规定了两年试用淘汰制，为培养青年研究人员，亲自为他们拟定三百多部必读书目，乃至亲自为他们修改文稿。文学所初建，图书资料匮乏，需要平地起家，他把这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来做，聘请专门人才，到全国各地和民间去采购，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耽搁，1977年，文学所藏书仍达到90多万册，包括许多古本、善本、珍本书，占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藏书的一半，还聘有能够将古本图书整旧复旧的工人。这都与何其芳重视图书资料工作分不开。文学所在1964年前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和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各个研究组、室的建制，基本都是在何其芳同志任内建立的。包括《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学知识》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外国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刊物及其编辑部的建立。当时文学所还出版过《文学研究集刊》《文学评论丛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70余卷。正是以上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文学所迅速成为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文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何其芳堪称文学研究所的模范所长和《文学评论》的模范主编。他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勤恳治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都永远活在文学所全体同志的心里。

作为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何其芳还为发展我国的文学评论事业，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著有多种文学评论集，《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则编辑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文学评论，包括他宣传和纪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多篇文章和对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他的《胜利的战斗的二十年》这篇长文，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20周年而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地总结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成绩与偏差，既反左，也反右，既旗帜鲜明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主张，又批判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既坚定地捍卫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时深刻地阐明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包括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艺术美的创造和艺术才能的存在，以及个人在艺术创造方面的作用等，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发展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其中的观点，至今仍然显示出真理的光辉！何其芳曾经深入地研究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并写出3万多字的长文《论〈红楼梦〉》，在我国红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一部深刻之作。他在《论阿Q》等论文中所提出的“典型共名”说，已成为学术界共认的具有独到发现的一家之言。他所写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的文章，也充满真知与灼见。在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他组织安排所内研究人员编写《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自己亲自参加讨论提纲，还不止一次为编写中国文学史问题发表讲话和写文章，对撰写这类著作的任务和原则，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他领导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后来都被国家教育部颁定为大学文科教材，可见其重要的影响。他主编的《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印行数十万册。他撰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为这篇序言修改了3次，传为我国文学界的殊荣和佳话！毛主席曾称赞何其芳办事“认真”。何其芳不但是党的优秀干部和卓越的学术领导人，他还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公仆。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和宽阔待人的胸怀。不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丝毫不苟！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受到冲击，被批斗过，心怀委屈，但即使让他扫厕所，到了五七干校，又让他喂猪，他打扫的厕所十分干净，他喂的猪也肥肥胖胖。他还自己编了歌谣：“猪忧亦忧，猪喜亦喜！”可见他对革命工作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与耿耿情怀！文化大革命后，他痛惜失去的宝贵时间，急于恢复文学所的研究工作，亲自带领全所人员打扫办公室和图书馆，筹划恢复《文学评论》杂志，还不分日夜地写作。仅一年多时间里，他就新创作了诗歌十多篇。他还赶着写回忆录《毛泽东之歌》，回忆自己到延安后所受到的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的过程，直到他病入医院，临终之前还催着要校阅这篇文稿的清样。他对革命和文学事业的鞠躬尽瘁的精神，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为感动！

作为在何其芳领导下工作过的后辈，我深感他是个高尚的人、真诚而正直的人，对待同志总怀着赤子般的热情和真心，他的品格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在他生前，出版有文集六卷；在他身后，编辑出版有全集八卷。他的文集和全集，无疑是他留给我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珍视！而他作为革命文学工作者的光辉榜样，也永远会为后人所铭记，并鼓舞后来者踏着他的足迹去继续为革命和文学事业努力奋斗！

期待文学的技术性批评

□许春樵

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批评是教父，也是教练。教父的角色是引导作家靠近神灵和抵达终极，属于精神指引；教练则是告诉作家靠近和抵达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属于技术指导。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在“文以载道”的理念下，一直把文学的意义阐释和思想境界作为文学的最高目标，《毛诗序》里最早提“诗言志”，《典论·论文》断言诗“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还可以“美教化、厚人伦、经夫妇、正得失”。到后来我们也常常把文学当做思想的工具来使用，文学批评的文本也是绞尽脑汁地在文学作品中挖掘思想、寻找意义。

文学批评这么做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我们批评的全部注意力都聚焦在从历史、现实或人生中挖掘思想和寻找意义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则陷入了另一种危险，即批评单一化形态下对文学的技术分析与秩序论证呈现出集体性的回避和忽视。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批评都在当精神教父，而不是当技术教练。

从作家的实用功利主义目标出发，作家对教练的需求远远大于对教父的渴望。

作家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与作家的学识、教养、修行与人生经验密切相关，一时教不出来，虽可引导，却不是轻易就能让他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而技术却是有章可循、有法可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是可以教会的。

一个写作者，如果有了基本的技术支持，哪怕是跑龙套，也可以在文学舞台上分到一个小角色；如果你五音不全、唱腔跑调甚至连台步都不会走，舞台上连跑龙套的角色都不会留给你。在我看来，当下许多作家的创作困境是因为技术准备严重不足，技术训练残缺不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长篇小说写出来后，无声无息或无人问津，这对作家的信心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一个作家没有那么多的自信可供期刊、出版社和读者的反复冷遇。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说的技术有问题，把长篇小说写得不像长篇小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在一个出版和阅读越来越大众化和公共化的时代，作家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对文学作出的新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转型与调整的能力？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致命的提问。

很多时候，作家不缺思想，不缺高度，而缺技术，缺情感。中国的长篇小说只是篇幅上的长篇小说，而不是技术上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就像一幢大楼，应该有圆整的结构和匀称的支架并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读哈代的《苔丝》、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复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就会发现，我们的长篇小说在技术上首先是不会搭架子，写到哪儿算哪儿，人物和情节或轻或重，或左或右，闪闪烁烁，没有定性，没有技术整合能力将其打造成一个圆融而和谐的整体。

也许会有人说，你再看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还有马尔克斯、福克纳的作品，哪有什么结构？这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个骗局，我们所说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实验性小说，即提供了理论研究上的小说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作为小说的主流价值和主流地位来引领小说的方向和道路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一度以“反小说”的姿势出现，对小说的基本技术和固有纪律进行了颠覆性破坏，结果是我们没有凭借“先锋实验”赢得国际化的荣誉，反而忘记了小说基本的操作技术。当我们疯狂扑向普鲁斯特、福克纳、罗兰·巴特怀抱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点，他们这么干是剑走偏锋，而我们这么干却是拾人牙慧。

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流是形式主义文论，说白了就是技术批评，从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诗论、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诗学主要是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依据、途径、方法和道路，即“怎么写”，因为“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所以文学的内容不是文学的核心价值，告诉你写什么，你出来的不一定就是文学，告诉你精彩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与立意，写出来同样有可能是苍白而空洞的作品，一个好的素材、好的立意，在不同的人那里，写出来的面貌完全不一样，作品的高下取决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了，即取决于技术的高低。

小说的一些基本要素是不可颠覆的，比如故事、人物、情节、细节、结构、节奏、气韵，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写气韵，那是说短篇小说，如果写中篇小说，那就必须得有个好故事，长篇小说除了好故事外，还得有好的结构，说长篇小说就是结构艺术，意在强化结构对于长篇小说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小说的技术范畴，比如长篇小说的结构通常是复式结构，复式结构的几条线之间如何构成戏剧性关系，这里面就大有文章，还有情节关系、人物关系的戏剧性设计都直接决定着主体结构是否牢固、合理与有效。小说的戏剧性设计的模式和类型，小说的支线与次要人物在和主要人物与主要情节纠缠中的叙事控制，小说的细节选择与对话质量把握，都有其体系性和规律性的学术纵深，还有小说创作中对人物情感本位性体验的准确和到位，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创作状态的酝酿、爆发、保持、延续的规律性研究，都可以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来实现。创作心理学中的创作状态与创作体验的研究分析，对作家的创作将会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小说的思想在天上，故事和人物却在地上，我们写小说写到一定阶段后，发现上天容易贴地难。如何编一个把读者忽悠得乐而忘返或痛不欲生的好故事，这几乎需要作家一生去努力奋斗，好故事需要生动的人物、精彩的情节、绝妙的细节去完成，所有这些，除了靠作家惊人的想象力，靠人生的经验、学养、智慧，还必须靠文学的技术批评提供持续不断的技术渗透与警示。

作家的批评观

综述 探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

□潘 源

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构想，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大目标，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于2012年4月26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在京50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张庆善在致辞中指出，面对新的国际竞争态势，我们应当本着以开放促变革、以借鉴谋发展的态度，积极甄别和学习各国的优秀文化，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这些无疑需要各位专家与学者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研究与思考。

在研讨会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与理论视角出发，围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策略与路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艺术在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与意义，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传播等诸多议题，从理论、政策、实践等不同层面，对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如何应对国际挑战、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选择正确的文化发展路径，制定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策略。对此，与会专家在深入分析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基础上，将学术理论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现实相结合，提出了诸多建设性建议。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将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依靠全体中华儿女一起向着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共同不懈努力。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着眼于不同文化类型在软实力建构上的不同作用，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路径。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庞井君认为，中国发展文化第一是要突出核心价值；第二要把文化发展的制度与路径设计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之中；第三是要解决媒介融合和新媒体等传播问题。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高书生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提出应合理调整文化结构和文化布局，促进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于群着重强调了文化事业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则强调，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否则很难提升我国思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无法真正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院长李怀亮认为，发展文化产业、扩大文化出口、优化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李小牧指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企业基础和产品基础，这些都依赖于在市场上冲锋陷阵的文化企业。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角度出发，探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主张通过发挥个人在文化竞争中的主体地位来提升文化软实力。

只有明确我国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独特含义，才能有的放矢地探讨我国自己的软实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重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从文化概念的学术层面切入，指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行政功能主导的概念，表述的是中国政府在运用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的特定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指出，“软实力”概念本身也在发展变化之中，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对此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强调，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应注重民族的精神谱系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陈飞龙在系统梳理我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大力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所以，我们需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与手段，建设覆盖面广、层次丰富的强有力传播体系，加大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和广度，提高我国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使我国的文化及价值观获得最广泛的认知与认同，从而有效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指出，文化软实力自身包括两个内涵：传播力和影响力。新华通讯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着重探讨了国际传播的本土化战略，强调了该战略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途径。文化软实力涉及文化影响力竞争，而电影、电视处于全球文化竞争的前哨，所以，影视传播是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则以家庭伦理剧为例，探讨电视剧如何反映社会道德规范，引导人们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进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摩罗谈到，在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时，要以国家的硬实力为条件。《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指出，促进文化认同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但提出了文化力量这个概念，而且和重视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一样重视文化力量。当今，我们不但要弄清楚我们的文化力量在哪里，而且要充分运用这种文化力量，建设文化强国。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李心峰、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郑长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探讨文化软实力的建构问题。

此次研讨会是对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一次总结，也是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进展的有力推动和深化。

《延安文学200期作品选》面世

本报讯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暨《延安文学》出刊200期，文学丛书《延安文学200期作品选》近日面世。该套丛书约300万字，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上、下）、散文、诗歌等5卷，共选编收录了《延安文学》出刊200期以来发表过的452名作者的464篇（首）作品。入选丛书的作者包括诸多国内知名作家以及部分陕北本土青年作家，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陕北文学取得的成就。

创刊于1979年的《延安文学》是陕北惟一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2012年第1期为出刊总第200期。该刊始终坚持严肃、崇高的办刊方向和高品位的美学追求，共发表了上万名作者创作的约5000万字的作品。（高 权）

国家大剧院迎来第200场“周末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徐健） “我们曾经走遍半个世界，如果必要就再出征。战士们出发！出发！出发！”在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雄壮激昂的歌声中，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日前迎来了第200场演出、第40万名观众。

“周末音乐会”最初源于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想要提高国内交响乐推广普及水平的想法，以此为契机，大剧院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等国内7大院团广泛接洽，充分交流，最终确定演出为主、知识介绍为辅的形式。为此大剧院专门划出每周日上午音乐厅的演出档期，以打造一个稳定的音乐普及推广品牌为目的进行运作。自2008年“周末音乐会”正式启动以来，4年间共演出作品达1082首，作曲家达到171位，近50家中外院团参与到演出中。据悉，今年大剧院还将同北京电视台合作推出《古典也流行——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栏目。

作家诗人赴广西上林采风

本报讯 “徐霞客上林足迹游作家采风活动”近日在广西上林县举行。潘琦、范咏戈、王必胜、彭程、王久辛、石一宁、冯艺、黄宾堂、赵如锋、林万里、汤松波、常海军、罗传洲、潘荣才等36位作家、诗人参加采风。作家们沿着徐霞客走过的足迹参观采风，对上林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深有感触，表示要在创作中反映上林颇具特色的民族与地域文化。

有南宁“后花园”之誉的上林县文化底蕴深厚。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曾驻足上林探秘考察54天，并在其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中留下了关于上林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的描写。（覃继南）

贾晓莉古筝独奏协奏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贾晓莉古筝独奏协奏音乐会日前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该音乐会由古筝教育家、演奏家李萌担任指导，特邀中央音乐学院EOS乐团协奏，指挥家许知俊执棒。在曲目安排上，突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其中一部分是由中国、日本前沿作曲家、演奏家们新近创作而成的现代作品；古曲分别为潮州筝曲与广东粤乐。在古筝弦制的选择上，使用了传统五声21弦筝、传统五声23弦筝、传统钢丝弦21弦筝和多声筝，几乎涵盖了目前所有古筝弦制。

运用多声弦制筝来演奏是此次音乐会的一大亮点。多声弦制筝在不改变五声、七声弦制弹奏法的同时，加进更多的音及音色，并在琴体不加大的情况下，让双面古筝互用共鸣箱，使得乐器有较好的声音，是近年来国内古筝界的一大创新。（音 文）

中国式原创力推广计划启动

本报讯 由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式原创力推广计划启动仪式近日在京举行。中国传媒大学特设立了艺术设计研究中心负责该文化计划的具体实施，并将以该中心为枢纽，联手国内外知名院校、文化机构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活动。

据介绍，中国式原创力推广计划旨在通过邀集全球华人的原创思想，致力于扶持具有民族个性、国家特色的中国式原创力。该计划的日常事务包括原创力基础研究、培养、邀集、包装和推广，涵盖的内容包括游戏、广告、出版、制造业、建筑、时装、动画、电影、音乐、创意产品、媒体节目、数字技术、软件、表演等文化产业的多个领域。该计划由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提供公益资助，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捐赠签约仪式也同时举行。（范 得）

大手拉小手 诗人在行动

本报讯 由诗歌中国网、中国诗歌流派网、北大繁星诗社、中国原声诗社、中工网、搜狐微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大手拉小手”关爱山区儿童公益活动第一季“诗歌与童年——百名诗人拉手百名儿童”行动日前启动。诗人们前往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康家集、赵家咀两所小学看望山区的孩子们，并为他们送去书籍和衣物等。志愿者们不仅前往贫困学生家中走访，还与康家集小学参与“大手拉小手”活动的60名学生进行了联欢。据悉，该活动以后还将继续开展，更多诗人及志愿者将走进贫困地区，为孩子们送去温暖。（欣 闻）